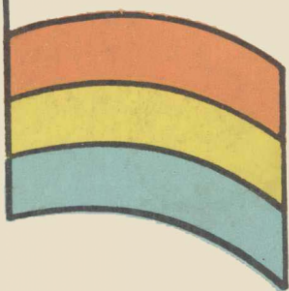


局内旁观者 ——赫德

邱克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吴秉辉

封面设计 曹 刚

ISBN 7-224-01511-3/k

定 价：2.95元

局内旁观者

——赫 德

邱 克 著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局内旁观者

——赫德

邱克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富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插页 10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4-01511-3/k·210

定价：2.95元

前 言

赫德 (Robert Hart) 1835年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1854年大学毕业后,被英国外交部选拔来华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50余年的旅华生涯。自1863年起,他担任清朝总理衙门所属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直到逝世才予卸任,共48年。赫德利用海关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对晚清外交政策的筹议和定策,乃至对外交涉的因应与周旋,几均身预其事,甚至包揽把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操纵近代中国内政外交、左右清王朝安危祸福方面,他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个来华的外国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在他的身上浓缩了中国近代外交畸形发展的深刻内容,因而很有必要详加探讨。

赫德在华时间甚久,活动领域极为广阔,与清政府和西方各国都有着颇为微妙的关系,从而留下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形象。从不同的立场、角度观察,往往可以勾勒出种种不同的脸谱。加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历来对他的评价都抑扬不同,毁誉各殊。

西方不少历史学家从来都是以歌功颂德的曲调来评价赫德的。他们盛赞赫德在中国建树了“无与伦比的”、“远东传奇式的辉煌业绩”^①,认为他“以尽忠中国为一生之使

①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命”^①，“对许多事情采取纯中国人的观点，因而长期得到中国政府的信任”^②。一些海外中国学者也认为赫德并非“一般所谓帝国主义侵略者”^③，而是“以中国政府为服务对象，不因国籍而自生外心”^④，“表现了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建设性的一面”^⑤，甚至认为他的目的“均在为中国效力”^⑥。这些学者在研究赫德与近代中国外交的关系时，往往受到一种西方中心论意识的影响，把近代历史发展的最高限度仅仅确立在仿效西方的单一模式上，而未能考虑到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对各民族走向近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简称Origin), Vol.4, p. 203; also see J. Bredon, Sir Robert Hart: The Romance of a Great Career; S.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P. King, 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A Personal Record of Forty-seven years; W. A. P. A.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E. B. Drew, Sir Rober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in the Chinese Student Monthly, Vol. VII, Nov. 1911.

①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第127页。

②Origin, Vol.7, p.383.

③Luke S. K. Kwong (邝兆江)：A China Career In Detail; Robert Hart's letters to J. D. Campbell (Review Article),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 XI, 1980.

④姚崧龄：《楚材晋用之赫德》，《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2页。

⑤吴相湘：《英人赫德主持中国海关四十五年》，《历史与人物》，第224页。

⑥程文华：《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之关系》，《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31期，1975年。

代、走向世界的巨大影响，因而由此得出的某些结论不尽符合近代历史的客观事实。此外，不少论著对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的关系仅仅限于就某些交涉过程作出轮廓性的描述，还缺乏细致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除了主观和历史的原因之外，这一现象与近代外交档案的大量散失有很大的关系。赫德所参与的外交活动大多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就连当时一些朝廷贵族、封疆大吏，对于其中波诡云谲的交涉细节，所知也微乎其微。在获得第一手资料之前，人们很难对分析赫德参与近代外交必不可少的各种变量有深入的了解和贴切的认识。

本世纪80年代，是重新研究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关系的大好时机。在此期间，赫德的通信集、日记及其他资料已大多出版^①。国内所藏清代外交档案和海关档案亦开始较容易地供学者利用。同时，有关这一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也逐渐增多，而且一般说来皆属佳作^②。从史学观点来看，不少人已从一般社会历史的角度强调史家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逐步转向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深入认识赫德与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联系。这无疑标志着赫德研究的深化。

笔者不拟在这本书中承担起对赫德一生功过及其历史作用

①J.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2 vols; K. F. Bruner et al ed.,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

②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展望出版社，1987年；叶凤美：《赫德在中国》，《近代中国对外关系》（《近代史研究》增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卢汉超：《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

的全面评价，事实上这样做也是不大可能的。外交是赫德在华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评价这个历史人物的争论焦点。本书的目的，是以赫德为主要线索，联系中国封建外交结构的内部变化，深入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作用与影响，阐明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形成及发展进程中的某些特点，并且期望重新探讨与这一主题有关的一些问题。

赫德在华的半个世纪，是西方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由封闭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国近代外交，就是在这一过渡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经常性的、“华夷混一”的对外关系模式。它以中外不平等条约为法律基础，以西方国际法为主要规范，以遣使设馆、建立永久外交关系为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论及的近代外交，是对过去封建朝贡外交的否定，从而代表了一种过渡和转变的趋势。但其本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外交，当然也有别于近代主权国家的独立外交。

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的关系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一反过去一些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恶劣形象，以清政府客卿的身分，利用海关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特殊关系，取得了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作为中国亟须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面貌和需要进行改革和开放的始终不渝的鼓吹者，赫德以海关为根基，从开拓对外关系打开缺口，影响和诱导了清政府对传统封建外交进行改革，促成了西方近代外交的某些思想和制度在中国的移植，也增进了清政府官员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应该说，这在当时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赫德对中国近代外交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所谓直接影响，就是他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特权在海

关推行近代化事业，更新了近代中西关系，促进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主动精神。所谓间接影响，就是在列强入侵的逼迫下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清政府自己进行的外交变革。在这一方面，赫德是一个局内的旁观者。他对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影响和推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国的内在条件，特别是进步与保守势力斗争的结果。近代中国外交制度，无论从建立动机或客观动机看，都是既有适应外国资本主义需要的一面，同时也有抵制外国侵略的一面。两个方面都客观存在，是任何半殖民地国家外交都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赫德所起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无论如何不应估计过高。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封建势力本身对外交近代化以及吸收、传播外来先进文化所带来的阻碍作用。

赫德帮助中国，不一定完全出于善良的愿望。即使他本人、确实没有任何恶劣的动机，也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所介绍和引进的西方近代外交模式几乎都已经令人沮丧地扭曲和变形。犹如一盒被污水泡湿的火柴，虽然孕育着火，却始终点不起火，也冒不了烟。其原因很简单，当时根本没有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集团或杰出人物能在短时期内使中国由弱变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提出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或主张。这是被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及其他主客观条件限制了。从赫德本身来说，他的确并不希望中外交往的扩展导致清王朝这块久经剥蚀的帝国大石滚进下面的深渊，而是企图使之恢复平衡，稳定在悬崖的边缘上。在此基础上引导或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使其有利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最大利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不管怎么说，在他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外交制度所包含的资本

主义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就应当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从总税务司到外交顾问	1
一、赫德对中国海关的改造	2
二、海关作用的扩大	8
三、海关与外交的关系	12
第二章 赫德与国际法在近代中国	22
一、西方国际法的引入	22
二、如何对待治外管辖权	30
三、分析几起涉外法律纠纷	38
第三章 晚清驻外使馆的建立与发展	48
一、遣使设馆的背景	48
二、近代最初的遣使活动	56
三、赫德与中国驻外使馆	64
第四章 京师同文馆与近代外交人才的培养	75
一、同文馆的初期建设	75
二、赫德对同文馆的改造与“扶持”	81
三、京师同文馆的评价	90
第五章 结语：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96
一、赫德的历史作用	96
二、赫德的阶级性与民族性	100
三、赫德的个性特征	107

四、赫德的改革主张	112
五、赫德与中国外交近代化问题	115
六、赫德的历史观	118
附录一 《清史稿·赫德传》补注	121
附录二 威妥玛就赫德《局外旁观论》给 拉塞尔勋爵的两封信	135
参考文献	139
后 记	152

第一章 从总税务司到外交顾问

赫德于1854年7月来到中国，不久即被派到宁波（后来调至广州）英国领事馆工作。他刻苦学习汉语，深入了解中国朝野政情，广泛结交清朝地方大吏，深得英国官方人士的赏识^①。不久（1858年以后），由上海外国税务监督演变而来的外籍税务司制度逐渐形成，原江海关英国税务监督李泰国被任命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②。这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半殖民地海关制度的开始，也是中国政治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的预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许多变化都与海关有着密切的关系。1859年，目光敏锐的赫德毅然辞去英国领事馆的职务，进入中国海关。两年之后即登上了署理总税务司的高位^③。或许人们永远也搞不清楚使赫德确立这一转变的最初的契机，然而事实

①K.F.Bruner et al., ed.,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 pp.10, 16, 17, 65, 68, 76, 92, 110, 138, 179; J.Bredon, *Sir Robert Hart, p.44;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以下简称Origin), vol.7, p.377.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第2705—2706页。

③J. Bredon, op. cit. pp. 51—52;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廛译本），第147页。

证明了进入海关确实为进一步实现他的长期政治目标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一、赫德对中国海关的改造

赫德担任署理总税务司后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对原有的清朝封建海关进行全面的改造。海关虽然已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性质，但作为清朝封建专制制度躯体上的一个器官，它仍然具有其躯体本身所有的一切弱点——混乱、贪污和低效率。

首先，清政府设立在各口的海关，一般都在各省督抚控制之下，由海关监督和海关道负责管理。各海关税则章程、人事安排、财务监察以及关税纠纷的处理等等，均各自为政，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海关行政系统，与其它查私机构也缺乏配合，关政十分混乱。

其次，海关税收历来被视为利藪，侵蚀偷漏，百弊丛生。清朝征税制度规定由中央政府确立上缴一定数额的税额，其余部分则可由海关自行处理，多数都被大小税吏侵吞自肥。赫德曾于1861年写信向总理衙门揭发粤海关监督侵蚀海关税银的行径^①。实际上这种“饱私囊而漏公项之弊”在沿海各口和内地各关都有存在，清政府对此始终拿不出一套切实有效的防止办法。

再次，旧海关结构松散，经理不善，“用人杂滥”^②，也使其工作效率极低，各海关偷税漏税及其它走私活动甚为猖獗。据赫德估计，仅广东走私食盐、鸦片和其它物品，每年至

^①外务部档，第4819号，第8函。

^②《李鸿章全集》，卷1，第871页。

少偷漏海关税银85万两以上^①，而粤海关每年总税银亦不过120万两^②。

显而易见，这种落后的行政制度、关税制度及海关的作业方式，不仅阻碍了国内经济的交流，也不利于正常的中外贸易的发展。随着近代中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改革旧海关已是势在必行。于是，赫德决心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面貌和需要，对中国海关进行逐步改造，努力把每况愈下的局面扭转过来。

在行政方面，他参考西方近代海关的行政组织形式，把各口海关行政完全从地方当局手中剥夺出来，集中到总理衙门和对它负责的总税务司的手中。举凡各关行政组织、人事管理、财务制度、征税章程，都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改变了以前各自为政的情况，统一了全国各关的征税工作，提高了海关的效率。

在人事管理方面，他采取仅让各海关监督“主名”的办法，将所有“办理征税、查拏私漏”的工作都交给外籍税务司担任^③，“从未有华人充当者”^④。这样就取得了西方各国资产阶级的承认，即所谓“多国合作的基础及国际上的认许”^⑤。海关监督“呼应不灵”^⑥，“实同虚设”^⑦。而仅对总税务司

①总理衙门清档，第76册。

②海防档（购买船炮一），第10—15页。

③外务部档，第4820号，第18函。

④外务部档，第0749号。

⑤Robert H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p.155.

⑥外务部档，第3941号。

⑦黄序鹗：“海关通志”，第11页。

负责的各海关税务司则“每多自行独断，绝不相闻”^①，有利于赫德进行高度集权管理。

在征税和财务方面，新海关规定外商卸货，验估货税后，由海关发给验单。外商持单到清政府指定的银号纳税，由银号发给与验单税额相符的收据。海关根据收据统计关税，用中英文编制帐目和季度报表，分别呈送海关监督、总税务司署、总理衙门和户部查验。海关职员支取固定薪金，按级增薪，成绩卓著者每年酌给酬劳金等。征税费用也由清政府另外拨给，不能侵蚀关税，使旧海关以税款中饱的弊端有所革除，海关行政管理机构更加严密和完善。

近代中国海关其它一些新制，如对外贸易资料的统计与刊行、海关出版单位的设立、稽核制度等等，都是在赫德手上完成的。这套由赫德规划定型的近代海关制度影响较大，后来只有枝节局部的改变，甚至进入民国以后依然如此^②。

海关第一位总税务司李泰国任内，只是在上海、广州、汕头等地开办了新关。赫德署理总税务司后，第一年即开办了镇江、宁波、天津、福州、汉口、九江等海关，第二年开办了厦门海关，第三年开办了烟台海关和台湾淡水、基隆、打狗（高雄）等海关，在中国沿海地区及长江流域，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到1904年，共设新关34处，另外管理常关19处，厘金7处，海关职员由千人增至万人，近代海关的势力扩展到全中国几

^①外务部档，第4359号。

^②赵淑敏：《中国海关史》，第20页。

乎所有的通商口岸^①。因此，赫德虽然不是中国近代海关的最早创始者，但他却是最重要的实际创建者。

在赫德的经营擘划下，近代海关严格管理制度，广泛罗掘税源，配合了西方各国扩大对华贸易，增开商埠，加强商品的倾销和原料农产品掠夺的行动。海关税收也以较大幅度增长，效果甚为显著。如厦门海关1862年采用赫德所拟章程，不久税银就比过去增加近两倍^②。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赫德主持海关后税收的增长情况：

年 代	海关税收数目	资 料 来 源
1862年以前	4 900 000 两	《清史稿、食货志》
1862	6 630 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26号
1871	11 400 000 两	“ “ “ 26号
1874	11 490 000 两	“ “ “ 26号
1875	11 960 000 两	“ “ “ 29号
1876	13 150 000 两	“ “ “ 29号
1880	13 000 000 两	“ “ “ 11号
1888	15 000 000 两	“ “ “ 11号

①外务部档，第3979号。
 ②外务部档，第4819号，第13函。